

集四部分类法,而改为先将书分为经、四书、子、史、集、各家六大类,然后再继续细分为小类。还有黄虞稷编撰的《千顷堂书目》32卷,不仅仅著录自家所藏,收录了上至明代十六朝帝王将相的作品,下至文人平民的野史杂记,所以在《四库全书总

目提要·千顷堂书目》中说:“考明一代著作者,终是以是书为可据。”其次他还补录了辽、金、元人的著作,使得从宋代至明末,有了比较完整的一代典籍的著录。

·皋兰台·

百家珍藏成渊海

——从《湖湘近现代文献家通考》到《湖南图书馆古籍线装书目录》

徐 雁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江苏南京 210093)

湖湘为地灵人杰之邦,乃是文献学者所梦寐之地。去年秋间,竟得两度涉足:

第一次在10月25日下午,在长沙韶山北路169号承湖南省图书馆雷树德副馆长陪看馆藏曾国藩书札亲笔。其中一本《曾富厚堂公记书目(副本)》,当时文物管理委员会负责人陈裕新于1950年2月29日手书附记,交代其来历颇为清晰。

将近一个月后的11月20日下午,应邀出席在湖南双峰举办的“第四届中国现存藏书楼联谊会”,遂得以前往荷叶镇富村,游玩始建于清同治四年(1865年),素有“乡间侯府”之称的富厚堂。大屋院内左旁有曾国藩于清咸丰七年(1857年)亲自规划营建的思云馆,以及藏书十余万卷之求阙斋(又称“公记”书楼)等三处藏书楼。由此对于湖南的藏书史有了一个鲜明的个案印象。

今年夏秋间,虽无再行湖湘之缘,却有观书卧读之乐。大抵可供卧读者为北京文献学家郑伟章、姜亚沙所著《湖湘近现代文献家通考》(岳麓书社2007年11月版),而所观之书,则为湖南省图书馆馆长张勇研究员任编纂委员会主任之《湖南图书馆古籍线装书目录》(线装书局2007年12月版)也。

两书恰好前者为源、后者为渊,构成历史文献在湖南的流传传承轨迹,高水平地填补了中国文献史在湖南一域的学术空白。

一 《湖湘近现代文献家通考》评介

郑伟章先生鉴于叶昌炽《藏书纪事诗》一书,仅简单涉及湖南藏书家湘潭袁芳瑛(?—1859)、宁乡刘康(1814—1890)、巴陵方功惠(?—1898年前)三人生平事迹而深以为憾,于是通过在故纸堆里的长期考证求索,编撰而成本书。

《湖湘近现代文献家通考》凡25万字。著作者在本书自序中总结湖南近现代文献史的特点有四,一曰“大文献家辈出”,

饮誉全国;二曰“重视整理乡邦文献”,形成优良传统;三曰“重视编纂、刊刻文献巨典”;四曰“重视书目题跋的编纂和版本、目录学研究”。由此可知,著述者宗旨,是在于通过三百余年来文献学家事迹的编述,勾勒出湖湘学术史之脉络。

为此,著作者稽考评述自藏书万余卷的晚明伍定相(生卒年未详)、著书近百种的清初王夫之(1619—1692)以来,至“年方弱冠,即从坊肆游”的叶启勋(1900—?)、自称为“书淫”的叶启发(1902—?)之间,共计八十位文献家的生平传略、文献活动、藏本菁华、藏书读书刻书处所、藏书印记、书目题跋、纂辑编刻书目,以及文献散佚、传承源流等史实,并每篇尾注参考资料来源和引用文献出处,结构严谨,层次分明,甚便读者阅读和学者检索。其实事求是之学风,爬梳史料之工夫,令人叹为观止。

王仪通诗云:“巴陵方与归安陆,一样书林厄运过。雁影斋空题跋在,流传精槧已无多。”《湖湘近现代文献家通考》特重考证和交代诸家藏书流散方向。大抵或被毁坏无存,或卖入书肆再次流转,或为图书馆所收购、征藏:

赵慎畛(1762—1826)……为官四十余年,聚书十余万卷,不乏宋元槧本……其裔孙赵胜云:“先人赵慎畛藏书及手稿毁于倭寇”,即日寇占领常德之时。故今甚少流传。

曾国藩(1811—1872)……1954年4月,湖南省文管会派员接收曾氏藏书……所藏标记为“公记”、“朴记”、“芳记”三处。“公记”为国藩所读过之宋元旧槧、明清所刻所抄四部古书及方志、曾氏家族史料等。“朴记”系其长子曾纪泽所用之书。“芳记”系其次子曾纪鸿夫妇所用之书。第四代管书人王席珍女士谓,其父王子陵亦系曾府管书人。富厚堂有《书目》,厚达半米。其书除大部归湖南省图书馆外,亦有曾被纪泽携至北京台基厂曾宅,而毁于“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之时。

方功惠(?—1898年前)……碧琳琅馆藏书多精本,质量

极高……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之变,“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京城一片混乱,人心惶惶不可终日,朝廷官员及市民均出城避乱。(其孙子)方湘宾亦仓猝弃书南归,藏书散佚不少。乱定之后,方氏将大部分藏书卖归琉璃厂书肆,不少流出域外,今从王重民先生《中国善本书提要》即可知。剩余部分尚有十数万卷,在李希圣鼓动之下,方湘宾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赠与京师大学堂。

郑伟章先生深味读书旨味,故于开卷首篇特引王夫之父亲之师伍定相劝读之诗云:“忘却人间事,始识书中字。识得书中字,自会人间事……传家一卷书,惟在尔立志。凤飞九千仞,燕雀独相视。识字识得真,俗气自远避”,认为“医俗无别方,惟有读书是”。并连类而及李佐贤、钱熙祚、吴引孙、梁启超四家读书论,证明我国自有重视读书的优良传统,进而申述自己的“读书观”云:“中国数千年积留之典籍,乃民族之灵魂、大脑、神经、骨髓。若无魂、无脑、无神经、无骨髓,其人焉能成立,岂非一怪物、废物?怪哉,今人终日只知蝇营狗苟,不知读书,视数千年典籍如敝屣,浑身铜臭,岂止‘俗气’?确实应该熟读伍师此‘劝读书’诗。”

其意拳拳,亦其从事政事商务之余,“狂耽文献耗中年”,不废读书著述之珍贵心得也。早在十余年前,郑先生就曾在《文献家通考》前言中谓:“中国数千年文明之发展,在在离不开书籍!历史是一条长河,任何个人不过是长河中的一个水分子,且瞬息即逝。唯有一艘不沉的巨轮在长河上由古驶今,还要驶向永远,它就是书籍!”认为现存我国各级各类图书馆书库中的十数万种古籍,无不凝聚着文献学家们辛勤耕耘的汗水和心血,“他们为中国的文化昌盛作出了不朽贡献”,有可大记特记者。

有此价值上的理性认识,故有自觉的著述行动。二三十年来,郑先生不避风晨雨夕,无论严寒酷暑,翻阅古籍逾千万卷,抄写资料无啻百万字,以所得中国文献家之宏富学识,先后著述为《中国著名藏书家传略》(与李万健合署,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文献家通考》(中华书局1999年版)、《书林丛考》(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初版,岳麓书社2008年增订版)等力著行世。

屈指数当今中国学术界案头掇拾之勤、坐馆读书之富者,或罕见可与比肩之人,而其上述著述亦皆“艺林绝业”(王颂蔚称誉叶昌炽《藏书纪事诗》语),足以传世者也。

二 《湖南图书馆古籍线装书目录》评述

随着二十世纪的时代变迁,二千余年来私有自为的民间藏书,逐渐为公营公益性的图书馆藏书事业所全面取代。

如今湖南省内所收藏的中国古籍线装书大约有200万册,由于近现代史的种种机缘,主要集中在湖南图书馆、湖南师范大学图书馆、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和湖南省博物馆等单

位。在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湖南省被列入的有90多部,其中湖南图书馆有59部,湖南师范大学图书馆有20部。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是由中国国家文化部在2007年负责组织评审的,主要收录1912年以前书写或印刷的,以中国古典装帧形式存在的,具有重要历史、思想和文化价值的珍贵古籍。其宗旨在于建立完备的中国珍贵古籍档案,进而加强对现存珍贵古籍的管理,确保其安全收藏,藉以推动整体性的古籍保护工作。为此文化部设立了由66名专家学者组成的“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负责《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评审工作。其评选标准原则上与《古籍定级标准》所规定的“一级古籍”、“二级古籍”的评定标准相同。

在馆藏古籍线装书68万余册的湖南省图书馆,其收藏具有五方面的特点:一曰“宋元本质量较高”,凡27种、32部;二曰“湖湘人物著述数量巨大”,多至2000余种;三曰“湘籍名人稿本琳琅满目”,藏有1000余种;四曰“地方志收藏完备”,藏有400余种、1000余部;五曰“家谱收藏蔚为大观”,藏有300余姓、3000部家谱。为此,湖南图书馆有关专家继承中国目录学的优良传统,持之以恒十余年,终于编成五大册的《湖南图书馆古籍线装书目录》行世。

据编者在本书前言中自述该省馆古籍线装书来源云,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社会变革的剧烈震荡中,湖南私家藏书纷纷散出,为此在1950年就成立了有湖南图书馆专家参与的“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专责从事流散文物、文献的收集工作:

其间湖南一些著名藏书家如湘乡曾氏求阙斋、沅陵冯氏十柳草堂、安化陶氏印心石屋、益阳胡氏箴言书院等藏书,都得到了妥善保护并收归国有。特别是湘乡曾氏藏书,除小部分曾国藩亲笔家书由其后人于解放前夕携往台湾外,其他藏书共10余万卷,其中大量尤为珍贵的曾国藩奏稿、批牍、书札等都完整无损移交国家,至今保存在湖南图书馆,成为日后湖南岳麓书社出版《曾国藩全集》的基础。

还有一些藏书家,如长沙叶氏拾经楼、华萼堂,长沙龙氏媚夜楼等,深明大义,化私为公,纷纷将所藏捐献国家。其中以叶氏藏书品质最为上乘。长沙叶氏(叶德辉、叶启勋、叶启发)、湘潭袁氏、巴陵方氏、道州何氏并称为“湖南近现代四大藏书家”,袁氏、方氏藏书都散出省外,何氏藏书也於民国年间多为叶启勋、叶启发兄弟所得。叶德辉观古堂藏书原于1927年叶氏身后由湖南省政府议决收归湖南省立中山图书馆,后因“马日事变”,遂不了了之,叶德辉藏书也随之散佚。而启勋、启发之藏却仍完整保存下来,并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捐赠国家。至今湖南图书馆善本书籍即以叶氏、何氏所藏为基础。湖南图书馆古籍线装书数量也由原来的不足10万册,剧增至90余万册。之后由于调拨、交换、捐赠等原因,数量有所下降,但仍有68万之巨。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作为机构撤销以后,社会流散古籍的征集保护工作,便由湖南省图书馆全力承担了起来。当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所谓的“破四旧”活动期间,该馆自当地造纸厂化浆池边、街头焚书堆中,就抢救出了大量的珍贵文献,如今所藏7000余幅古旧字画即大多源出于此。九十年代以后,又对湖南民间残存的家谱进行了抢救性征集,至今收藏各姓家谱3000余部。

上述丰富积累为编成一部具有馆藏指南性质的《湖南图书馆古籍线装书目录》,奠定了坚实的文献资源基础。于是在2005年,馆方经多次论证后决定,为更全面、更系统、更便利地保存和揭示馆藏历史文献,总结和完善该馆各历史时期的古籍收藏和古籍编目成果,着手编纂一部馆藏古籍线装书的书本式目录,旨在将馆藏68万余册古籍线装书尽皆收录,并以《古籍著录规则》的国家标准要求加以规范化的著录。

问世以后的《湖南图书馆古籍线装书目录》,除基本著录项目外,对于珍善之本图书还加注了行款、批校、题跋、印文等项目。在检索手段方面,除题名、责任者外,还把刻书机构、刻书人员等信息纳入了索引范畴,从而在古籍目录学领域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准。如通过《湖湘近现代文献家通考》一书所述可知:

陶澍(1779—1839)……自其父起至陶澍及子陶杕,三世聚至十万余卷。所藏间有宋、元、明刻本,大多系御赐清内府刻本、武英殿刻本、清初名家刻诗文集及自著稿本等……光绪初元,其书始散出,民国间所存已无几。1919年,遭张敬尧军队之劫掠,其后人仅存其部分手稿、信札及字画,残存之书由陶成龙等分藏。湖南省图书馆于近30余年中多方访求,得其明刻本《袁中郎全集》三十六卷、《集千家注杜诗》二十卷、文集二卷、《昌黎先生集》四十卷、遗文一卷、传一卷、外集十卷、《昭明文选》,清仿宋刻本《周易本义》,康熙间刻本《黄勉斋集》八卷,及陶氏手稿等三十余种。

如今只要通过《湖南图书馆古籍线装书目录》的“综合索引卷”,就能获知上述珍贵历史文献的版本状态。如:

《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二十卷、文集二卷(唐)杜甫撰;(宋)黄鹤补注·一明万历30年(1602)许自昌刻李杜全集本·一8册·一九行二十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左右双边。Δ432/84

《黄勉斋集》八卷(宋)黄榦撰(清)张伯行辑·一清康熙48年(1709)正谊堂刻本·一8册·一十行二十二字,白口,四周单边。Δ433/77

诸如此类,可见其便。而上述引文信息,都可补《陶澍评传》(陶用舒著,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版)之不足。

三 从“湖湘文献收藏宝库”到“湖湘人文整理传播基地”

殊途而同归,其实《湖湘近现代文献家通考》与《湖南图书

馆古籍线装书目录》先后编撰问世的终极意义,都在于或通过考求文献家事迹,或揭示馆藏地方学者著述和地方、家谱文献,以昭示“湖湘文化”的历史传统。或如作者们所说:

湖湘文化与湖湘文献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战国屈原赋《离骚》,开创楚辞诗歌体裁,宋代周敦颐作《太极图说》、《通书》,创立濂溪学派,清初王夫之纂《船山遗书》,宣传民族主义。清中晚期陶澍、魏源、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提倡经世致用,又将湖湘文化推向一个新高峰。而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等现代湖湘人物的著述及思想中,也无不蕴含着丰富的湖湘文化因素。而湖南图书馆一直是湖湘文献和湖湘文化最大的收藏和传播基地。我们相信《湖南图书馆古籍线装书目录》的出版,必将为湖湘文化的继承与弘扬发挥重要作用。(《湖南图书馆古籍线装书目录》前言)

大湖以南,其星翼轸,其山衡岳九疑,其水沅湘资澧,其湖洞庭泽国,水木清华,物产丰富,人杰地灵。尤其近现代以来,湖南更是人才辈出,样样不落人后。比如,湖南的文献事业自陶澍、魏源、曾国藩而后,更是如朝阳升起,蓬蓬勃勃地向前发展……通读之(指《湖湘近现代文献家通考》——引用者注),有如读一湖湘三百年来学术史也。

(《湖湘近现代文献家通考》自序)

从湖湘藏书家的百家珍藏,到湖南图书馆古籍线装书的集中收藏,近现代文献家们事实上进行着的,是一场又一场以历代典籍为重心的历史文献搜集、整理、保护、阅读和著述的学术文化的接力式长征,其前仆后继、可歌可泣的事迹,俱载于《湖湘近现代文献家通考》和《湖南图书馆古籍线装书目录》之中。

如湖南先贤著述收藏方面,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湖南历史上有书名可传的作者大致有6000余人,其中著述流传下来的约有2000余种。这些湘籍人物著述,湖南图书馆大多有收藏。但因以往这些著述受到区域性局限,往往印量很小,流传较少,因此在收藏上往往不被其他图书馆所重视,甚至不为各种书目所记载,如该馆所藏数百种湘籍清代、民国人别集中,为孙殿起《贩书偶记》所记载者不足90种。这也使得《湖南图书馆馆藏古籍线装书目录》在宣传、揭示和保存湖南著述和湖南地方文献方面将起到特别重要的作用。

再如湘籍名人稿本方面,在各种湖湘刻本外,湖南图书馆还收藏有各种抄稿本一千余种,其中大部分为近现代湘籍重要人物的手迹,在大宗收藏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等湘军名人手稿之外,尚有陶澍《使蜀日记》、何绍基信札诗文、郭嵩焘《养知书屋日记》、王先谦《蒙古通鉴长编》、王闿运《湘綺楼诗稿》、杨树达《盐铁论集解》、符定一《联绵字典》等。

这些具有极高史料价值的稿本,以往多因字体难以辨识,作者考证不易,形制不一,以往多未进行整理编目,但此次都在馆藏书目中得以著录反映,公诸于世,为学术界的利用提供了文献指南。

因此,当百家珍藏纷纷归于图书馆公库之渊海后,对于守书有责的湖南省图书馆来说,如何依据《湖南图书馆古籍线装书目录》,着力做好以古书修补为切入点的典藏保护工作,便是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

据分管该方面业务的湖南图书馆副馆长雷树德和该馆历史文献部主任寻霖研究员介绍,现在,该馆负责古籍文献修补的馆员共有六人。按照每位修补人员的工作定额是善本书籍每年2000页,普通古籍每年4000页。按此计算,修补完成目前亟待修缮的五万部古书,大概要花上200年的时间。而具有传

统手工艺特点的古书修补人才奇缺困境,又不是短期之内可以实现青黄相接的。

据悉,在目前图书馆古书典藏缺乏专项保护经费的现实下,该省图书馆古籍保管库装备的温、湿度控制机,也只能在温度高、湿度较大的有限数月内启动,因每天300元的运转维持费用,是目前该馆事业经费所难以支撑的。而如此窘境,事实上又在加速损害着已被自然因素风化侵蚀数百年的珍贵历史文献的寿命。

总之,对深藏于湖南省图书馆内的这一座“湖湘文献收藏宝库”的价值评估,应当尽早地统一到这原是具有本质意义的“湖湘文化传播基地”的关键认识上来。而组建一个归属于湖南省图书馆的“湖湘人文传播研究中心”,也已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憩园亭·

《清代书院与学术变迁研究》与《清代东南书院与学术及文学》述评

荣方超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江苏南京 210093)

自宋代书院制度正式建立以来,在书院的讲学之中,就有重视经学、史学和文学的传统。而兴复庐山白鹿洞书院的朱熹,在收徒讲学之时,更特别注重文学素质的培养。

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教授刘玉才博士所著《清代书院与学术变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3月版)与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副教授徐雁平博士所著《清代东南书院与学术及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7月版),是中国书院研究的最新成果。两位学人尝试着将书院教育纳入中国学术史研究视野之中,且均以清代书院与学术的关系为主线,从而使得书院在清代学术场景和文学活动中的历史角色得以更加明确。

清代书院制度延传前朝,虽有私立,但以官办为主,且书院的主体部分是考课式书院,服务于时文帖括。在文化专制和科举取士的时代背景下,书院作为一种教育组织形式,对清代的学术和文学都产生了积极影响。由于书院作为一种讲读之所,通过主讲者言延传身教,达到敦品励节,探讨学问的目的,讲究的是学行合一。因此,书院教育在清代学术流变和文学发展中有着独特的意义。这种独特的意义,源于书院独特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式。

刘玉才先生的《清代书院与学术变迁研究》一书是以书院为视角,利用清人文集、日记、课艺、书院志等文献资料,通

过对书院与重要学术环节关系的梳理,来考察书院学术风气的演变轨迹,进而达到丰富清代学术史场景的目的。他通过对清代书院和清代学术问题的剖析,探讨了清代学术发展的脉络。全书除导论、余论二章外,其他章节均以清代的学术变迁为序,分“讲学的余波”、“理学传统在书院的展开”、“乾嘉学术与书院的关系”、“诂经精舍、学海堂的学术示范”、“晚清书院学术取向的演变”等五大部分,条理清晰,论证源于厚实的文献积累,令人信服。是对清代书院教育与学术变迁的一次全景扫描。

他认为,清代书院本身“依然是所在地区汇聚士人的中心,而主持者多是知名度较高的学者,在没有讨论会和公共刊物等学术平台的时代,无疑仍会起到交流传播学术成果的作用,且对于学派、学风的形成有促进之功。”因此,书院在清代学术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书院作为有别于传统官学体系的教育形式,在教育职能之外,同时还是学术文化原创、传衍的基地……纵观清代学术史,学术变迁的重要环节,诸如清初诸儒的讲学、程朱理学的崇尚、乾嘉学派的构建、晚清学术的转向等,无不与书院密切相关。

徐雁平先生的《清代东南书院与学术及文学》,用上编五章通过五个个案研究来呈现书院、学术和文学问题的复杂